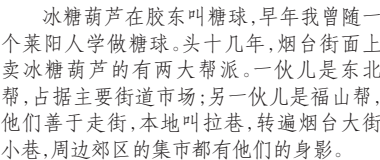


# 过小年要祭灶



福山糖球肯定有历史,但是行内又有点说不清,反正至少有几百年了吧。近年枣庄帮的加入,东北帮撤出,市场格局有所改变,但是,福山糖球依旧在。应该也算本土文化的一部分。福山糖球品种较少,主要做山楂冰糖葫芦和山药豆,也做一点软枣。

有市场就有竞争,像卖糖球这样的小生意竞争亦激烈。早年人们大多顾温饱,苦孩子年八辈难得吃上回糖球。自打改革开放,人们日子好过了,糖球好卖,一度可说是热销。可好景不长,随着市场开发深化,食品花色品种日增,糖球辉煌不再。还有外

地冰糖葫芦的加入,也加剧了市场竞争。以北京冰糖葫芦为例,人家花花样多,又是夹馅又是什锦,让顾客眼花缭乱,抢去不小市场份额。不过,福山糖球虽然大多还是老三样,因老主顾多,传统技艺还在传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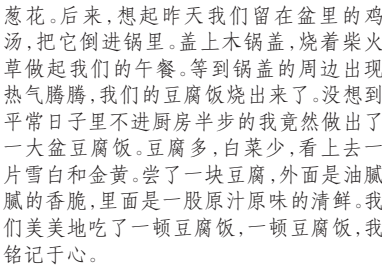
福山糖球做法简便，重在就地取材，有人就是植山楂树种山药收集摘豆，做成糖球自产自销。每到乡村大集，福山糖球必上据人流最多的路口。与外地小贩草用麦草捆扎托靶子插糖葫芦卖有所不同，福山糖球哥每人都有一只精雕细刻的梧桐木靶。梧桐木质较疏松易钻孔，而且梧桐向来有吉祥木之称，做成的靶子中间有大孔可穿木棍转动自如。一人多高的木靶子插着一圈一圈的鲜亮大糖球，山药豆和软枣插在靶子下边，因为都裹了糖，串串晶莹剔透，让人一望就有食欲。尤其是赶集的大姑娘小媳妇以及孩子们，看着糖球哥的靶子左一圈转右一圈转，大糖球小豆光彩照人，简直是垂涎欲滴。

童年，我在睡梦中，听见换豆腐的叫卖声。那是村西头李二婶推着木车，敲着木梆子换豆腐。乡村人家一般情况是用黄豆换豆腐，母亲挖一瓢黄豆，去换来两块热乎乎的豆腐。那时候的乡下，没有人家吃上大鱼大肉，这豆腐便是大家的奢侈品。想吃了，去换上一方豆腐犒劳自己，让自己的胃肠过一个“狂欢节”。

转眼间，年就来了。母亲提前几天和村头的老刘家订好做豆腐的日子。腊月二十的早晨，母亲把我叫起来，到老刘家去和她一起推豆腐，我的具体工作是和母亲一起推小磨。我们一圈儿又一圈儿地转下来，石磨“吱吱，吱吱”像唱歌儿一般。回到家里，母亲“忙活”着做豆腐，她通常把我打发到街上，嫌我呆在家里帮不上忙，只能给她添乱子。

我和几个小伙伴在大街上看那卖年画的、卖春联的、卖香火的、卖蜡烛的、卖鞭炮的。近了年根，乡村的大街上是人来人往，跟赶集一般。中午，回到家中，母亲已经做好豆腐。她将几棵小葱切成丝放在小碗里，倒上酱油拌好了。她将一块豆腐切成一小块儿一小块儿，搁在大碗里。我迫不及待地夹起一块豆腐，往小碗里一蘸，是小葱拌豆腐，越吃越香。豆腐鲜，小葱香，非常开胃，我兴高采烈地吃一餐好饭。腊月二十七，炸完面鱼，剩下油腻腻的锅。母亲将豆腐切成片，搁在油锅里，反过来，覆过去，煎出黄煎熏的豆腐片。以后，炒菜的时候装上几片，香气扑鼻，吃上一口，是舒舒服服的美味。

有一天，父母出了远门探亲去，赶上下雪天，在亲戚家多呆了一天。家里只有我和弟弟。中午的时候，我们发现厨房里面已经没有馒头。我们翻遍了整个家，才找到一方豆腐，还有一个大白菜头。我和弟弟说，咱们做白菜炖豆腐吧！我们切了一个白菜心。豆腐是一小块一小块切出来，放在锅中煎出来。把切好的白菜推进锅里，把煎黄的豆腐块倒在锅里，添上酱油，撒上了零碎的



过年后，母亲会把吃不动的豆腐切成一片一片的豆腐干，将它们摊在盘子上，撒上一层薄薄的盐，搁在平房里，晒几天太阳。风干了，便做成风味独特的豆腐干。母亲把它们装进塑料袋，挂在山墙上，想吃的时候，摘下来。炒菜的时候，把豆腐干打成豆腐条，炒到菜里。吃饭的时候，我专门挑那些硬硬的豆腐条，它们有一股韧劲，吃起来像是在咬一块昂贵的瘦肉。豆腐片、豆腐干、豆腐块，每年我家的豆腐总是能吃到第二年的阳春三月。

过年的豆腐非常香。如今过年，乡村人家不再做豆腐。我却永远记得母亲做出来的豆腐，那样的鲜，那样的美。最纯正的小葱拌豆腐，给了我一颗清清白白的心。

周子元

农历腊月二十三是“小年”，此后，家家户户便进入了“大年”前最忙碌的时刻，诸如打扫庭院，居室扫灰擦洗、制作过年的食品，一直忙活到除夕，这期间的劳累与热闹劲儿决不亚于年后。过小年这天，全家人要会聚在一起，祭祀灶王，吃顿团圆饭。

按民间风俗，过小年要祭灶，也就是“祭灶王”。因为它被供奉在锅灶上面，所以也叫它为“火头君”，民间都尊称它为“灶王爷”。灶王最初只管火，后来受天帝委派为掌管一家人的监护神，成了“一家之主”。虽然权利很大，却享受不到很高的待遇，连个土地庙大小的庙宇也没有，只有一张木板印制的画像，贴在灶墙上，每年到了腊月二十三，旧的揭下来再换张新的。

每年腊月二十三之前,集市上便有摆卖灶王画像的,民间称去“请”张“灶马”,有两人和三人的两种,处于

传统观念，一般都愿买灶王爷身旁只坐着正妻的二人像，而不愿买那张还有“小婆”的三人像。“请”回家后，贴在原先的固定位置上，两旁再贴上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和横批“一家之主”。

祭灶时，必须摆放上用大麦面发酵糖化而制成的糖瓜等食品，据说是考虑到它了解全家人一年来所说的所有言行，想用糖瓜把它的嘴吃得甜甜的，这样上天后光说好话。俗话“灶王老爷本姓张，一年喝顿供面汤”，所以烟台人祭灶时还会放上碗用白面、豆面、地瓜面混合做成的面汤（面条）。祭拜后将换下来的那张旧画像焚化，就算是送灶王爷上天向玉皇大帝汇报去了。来年正月初一的五更时分带着吉祥回来，保证一家人新的一年过上平安的日子。

随着人们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如今已没有人祭灶了，但过小年吃糖瓜的习俗，还在一些地方延续着。

# 难忘的1972年春节

刘烟生

1972年的春节前夕，我们这些到文登宋村公社西马大队插队一个多月的知青，正准备收拾行李回城过春节。突然，打谷场上的高音喇叭广播起了紧急集合的通知，老支书神情严肃地向大家传达了上级最新指示：今年过节要彻底与传统的旧习惯、旧风俗决裂，过一个革命化春节。

接着，老支书又具体宣布了过革命化春节的内容、形式和步骤。第一年三十晚上大队要认真组织关于忆苦思甜的革命传统教育节目和活动。第二，抓革命，促生产，初一照常上班。第三，移风易俗，破旧立新。初一见面不准说“过年好”、“恭喜发财”等拜年的吉利话，一律改成“伟大领袖万寿无疆”之类的祝福语等等。听说让我们回城过年，大家都不高兴，个个嘴撅得能拴头驴，年纪最小的“小豆豆”当时急得都哭了起来（当时17岁）。会后，老支书单独留下我们开了个小会，告诉我们：上面规定了不回城的知青每人补发三元补助费，“小豆豆”才破涕为笑。要知道，那时一天工分只有一角余钱，三元钱顶一个多月的口粮。

大年三十晚上，在打谷场上召开忆苦思甜大会。电线杆上高音喇叭播出：“天上布满星，月亮亮晶晶，生产队开大星，诉苦告怨伸……”歌声凄凉、悲哀，在夜风中飘散——凝聚，每一个音符都湿漉漉的，直唱得我们眼睛里蓄满了泪水。老支书在搭起的主席台上，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大家不要忘记过去，说了一些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之类的应景时髦话。

会后，吃忆苦饭。蒸窝头的灶台用砖坯临时砌垒在打谷场上。一摞摞大蒸笼像宝塔般矗立。光棍把作为老贫农代表，郑重地掀开蒸笼，一屉一屉抬了出来，摆放在大家面前。白色的热气在寒风中飘逸起舞，很是美丽。可蒸笼里的窝头，模样却不甚争气。由于麸子皮、豆腐渣、谷糠和萝卜缨子掺和在一起，粘合力不强，做成的窝头就像打了败仗的将军，蔫头耷脑，松散地呆伏着。据说，这是旧社会穷人吃的饭，今天吃它是最生动、具体的新旧社会对比的阶级教育课。

头我咬了一口，如嚼树叶、草根。牙疼、苦涩，散发野草味儿。本想囫圇吞下，偏偏到嗓子眼硬是不往下走。无奈，假装揩嘴，吐在手中，偷偷装进裤子里布袋。台上，贫农张婆婆正在控诉万恶旧社会。她说：“那年三十晚上，我领着儿子要饭。经过地主李大头的门口时，他家的恶狗忽然从院里窜出，朝着俺6岁儿子狗剩扑去，我冲上前举起要饭棍就和狗厮打。幸亏，惊动了人家大头兄弟。他出来唤住狗，并吩咐家人捞给了我们一碗水饺，另送2个大枣饽饽，这才过了个年哟……”老支书一听，知道张婆婆又说漏了嘴，本来规定让她说到和狗厮打就打住，这张婆婆一“亮噜嘴”又要讲那个圆满结尾，这不是替地主阶级歌功颂德吗？他连忙振臂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打断张婆婆的话头。于是，大家跟着呼喊口号，有人举起的手掌中还握着窝头，而我乘机把剩下的窝头装进衣口袋。

最后老支书宣布：散会，大家回去吃饺子，好好尝尝新社会的甜水。回知青宿舍，正红路上生产的猪圈，我和几个私藏窝头的伙伴像电影中的特务一样，窥摸四周无情况，不约而同地把口袋里的、腋窝掖着的窝头悄悄扔进猪圈。走出老远，还听到猪圈里的猪们欢快的哼哼叫声。我们这几儿人都不约而同地藏下野菜窝头，留着空肚子回来吃羊肉馅白菜饺子。只有“小豆豆”和另一个知青全部吃光。到了半夜，“小豆豆”却跑起了茅房。

初二午，在老支书的清脆哨子和吆喝下，我们极不情愿地从热被窝爬了出来。也没到乡亲们家拜年，拿着铁锹和聚齐的村民一道去东坡地挖萝卜窖(属于没活找活干)。下午，老支书照顾我们知青，让我们集体去观摩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邻近大队的演出。我们欢呼雀跃，兴高采烈，走了10余公里的路程，去享受这难得的文化大餐。

初二早晨，老支书安排光棍大叔套好牲口，赶着大车把我们送到文登县城。我们买了长途汽车票，乘车回家。怀揣着3元钱，大家个个挺胸叠肚，展扬得像个个百万富翁。

岁月过去42年了,每当回忆起那个“革命化”春节,总使人感叹万千!